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是個開放而又被阻隔的地方，既四面環海又四通八達，但因為種種國內及國際政經因素，台灣不斷陷入被挾持（entrapped）的困境。¹在這個獨特的時空中，發展出獨特的政治生態、經濟繁榮與生存方式，卻因為被挾持的困境而充滿了前途的不確定性，「反共」曾經是國家唯一的方向，現在卻成了矛盾的所在。所以羅伊（Denny Roy）在《台灣政治史》一書開宗明義就說：「台灣當前的處境是罕見且複雜的。」²連世界運動總會（IWGA）主席朗佛契（Ron Froehlich）也知道：「在台灣什麼事都有可能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³這些話無非說明當代台灣政治的複雜與棘手，發生在其中的所有事物很難與政治做適當的切割，就算是文學作品，或多或少會受到政治力與社會力的影響。⁴所以，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可以如王丹所說：「政治與文學的糾葛歷來是人類精神發展中的重要面向之一。早在文學的發源時期，它與政治就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⁵可以如王集叢所說：「無論什麼文藝作品，只要有資格紀錄於文藝史上的，對政治、對社會和人生，都有直接間接或大或小的影響。」⁶更可以如陌上桑所說：「一部好的文學創作，應該是既政治又文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原本就很複雜，文學與政治是分不開的。」⁷但重要的是，創作的心靈不是政治所能侷限，文學也不單單是為政治而書寫，政治和文學的糾葛雖如上所言繁多而複雜，畢竟只是文學的一個面向，並非文學的全部。

回溯政治和文學的糾葛歷史，大致可分成政治力干擾、政治文學創作與政治

¹ 廖炳惠：《台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頁106。

² （美）丹尼·羅伊（Denny Roy）撰，何振盛、杜嘉芬譯：《台灣政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初版一刷），頁1。

³ 引自曹明正：〈高雄世運 讓朗佛契改變對台態度〉，《自由時報》（2009年7月24日）A2版。

⁴ 王集叢：《文藝新論》（台北：帕米爾書店，1965年5月初版），頁88。

⁵ 王丹：〈政治與文學的張力〉，《自由時報》（2005年4月12日）E7版。

⁶ 王集叢：《文藝新論》，頁88。

⁷ 引自郭漢辰：〈文學的浪遊者：訪陌上桑〉，《文訊》第281期（2009年3月），頁33。

性解讀等三種形式。世界各國的文學歷程裡，皆有過政治力嚴重干擾的紀錄，如明、清的文禍與中世紀教會的禁書等等，代表著文學場域與政治場域間重疊的牽絆；相對於政治力的壓迫與禁制，政治文學創作則是對現實政治的直接反映，甚至反抗，例如：《詩經》與《烏托邦》等經典作品，便有其反映政治狀況或寄託政治理想的情懷；至於政治性解讀是一種高張力的分析行爲，若不羅織編派、過度解讀的話，也不失爲一種探究文本意義的方法，伊果頓（Terry Eagleton）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就屬於此類型，像班固〈兩都賦〉與張衡〈二京賦〉等作品，從「遷都之議」的政治面解讀，更能看出作者創作的政治動機。⁸至於近、現代以來，最擁護政治小說者，莫過於提倡「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他最常被引用的經典名句應該是作於一八九八年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爲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⁹姑且不論政治小說是否有如此大的功能，梁啟超想用小說的傳播力量集結共識，以建構民族主義的基本精神也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有幾分神似。

書面作品的文字符碼（code）經由交換與轉碼，未必能精準地傳達作者的信息；而讀者在接收譯碼之後，也不一定可如實獲知作者的立場或理念，正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言：「文學對象除了讀者的主觀性之外，沒有任何實體。」¹⁰政治小說不易寫，因爲必須在冷硬的教條與浮動的人世經驗裡，往來折衝尋找恰當表達方式。藝術與宣傳的分別就在一線之間。¹¹因此，充滿意念先行的政治文學是否能真正讓讀者了解作者的意圖與苦心，還是使讀者湮沒在政治思維的喧嘩之中？而充滿不同理念的讀者或評論者，是以什麼姿勢看待理念相同或不同的文本，他們逆推得知作者的政治立場後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觀感？余光中曾說：「在政治參與漸趨熱烈的年代，政治小說與政治詩也應運而生，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推一九七九年黃凡的得獎小說〈賴索〉。」¹²高天生卻認爲〈賴索〉是：「曖昧的戰鬥。」¹³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兩位學者身上，郝譽翔認爲：「『政治小說』是八

⁸ 涂元恆：《漢賦名家選集——班固、張衡》（台北縣：漢湘文化公司，2001年11月初版一刷），頁55。

⁹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一版一刷），頁35。

¹⁰ 引自格非：《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一刷），頁29。

¹¹ 此為潘人木之語，引自《民生報》訊：〈潘人木被公開肢解？：學者作家論小說滋味迥異〉，《民生報》（1989年4月16日）14版。

¹² 余光中：〈三百作家二十年〉，《聯合報》（1989年5月9日）21版。

¹³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頁171。

○年代興起的重要文類之一，以張大春與朱天心最為突出。」¹⁴不過周慶塘在《八○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研究》中卻不太討論張大春與朱天心的政治小說，而他用力甚深的林雙不、宋澤萊等人作品，郝譽翔卻完全不予置評。這說明不論是讀者或評論者，在閱讀或評論的過程中常常因為文本的召喚而產生了「界限」(boundary)¹⁵，因為政治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文學。著名政治小說家朱瑞 (Allen Drury) 認為：「很少批評家以小說的觀點來評價你的作品。他們評的多半是政治本身。如果你的政治觀點與他不同，嚴厲的責難就來了。」¹⁶評論政治小說既然是一種「政治」的行為，創作政治文學也就像王德威所言：「寫作政治小說本身，也是個『政治事件』，因為小說不只是透明的文宣工具，透過角色塑造，它本身成為不同理念意見的角力場。」¹⁷

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前進，形成一個個轉折的年代。歷史無法重來，政治無法歸零，政治永遠是一種歷史的延續，不論是承繼或斷裂，永遠都不可能和以前一刀兩斷、分割乾淨。麥克魯漢 (Harbert Marshall McLuhan) 認為：「政治是對今日的問題，提供昨天的答案。」¹⁸這或許是閱讀政治文學後，心有戚戚焉的地方。從日本殖民手中展開的台灣新文學，與稍早萌發於 1917 年的中國新文學運動都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兩個新文學運動有著相似的背景，不但有其外在殖民列強的侵迫或社會內部變遷的問題等待解決，更受到十九世紀末歐洲新思潮的民族自決論與二戰前國際動盪局勢與影響，意圖透過新文學運動掀翻那停滯不前的舊傳統基本因素，想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¹⁹在這種生態環境所產生的全新文化，自然懷抱著反殖民、反侵略、關懷苦難人民的政治意圖，這也就構成了新文學的人道精神與反抗基調。雖然伊果頓 (Terry Eagleton) 曾言：「我們迄今研究的文學理論都具有政治意涵」，²⁰有其獨特的時代意義；不過文學批評總是要利用文學促成某些道德與人生價值，反映某些社會思想意識與期望，也促使

¹⁴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東華人文學報》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254。

¹⁵ 「界限」(Boundary) 是巴爾斯 (F. Barth) 界定族群 (Ethnic Groups) 的概念，讓族群與文化脫勾，成為互動的、動態的獨特研究領域，不再只是附屬於文化之下的討論。請詳參黃應貴：《人類學的視野》(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 年 6 月一版一刷)，頁 86。

¹⁶ 引自黃美惠：〈朱瑞政治小說真假間顯灼見〉，《民生報》(1988 年 4 月 13 日) 9 版。

¹⁷ 引自《民生報》訊：〈潘人木被公開肢解？學者作家論小說滋味迥異〉，《民生報》(1989 年 4 月 16 日) 14 版。

¹⁸ 引自王壽來：〈麥克魯漢小檔案〉，《歷史月刊》第 236 期 (2007 年 9 月)，頁 139。

¹⁹ 請詳參林淇濤 (向陽)：〈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型態建構：以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為例〉，收入林淇濤 (向陽)：《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1 年月初版)，頁 123。

²⁰ (英)伊果頓 (Terry Eagleton) 撰，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5 年 12 月一版三刷)，頁 244。

文學批評最終存有某種特定的政治形式。據董保中的觀察：「從五四時期開始的現代中國文藝批評最注重的是作品內容的意義，具體的來說，便是政治性的批評。批評家們不但以不同的政治觀點來解釋文學，而且更進一步的在文藝理論上要求文學服務政治。」²¹這種觀察未必人人同意，卻也點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複雜性。相對的，台灣新文學可能擁有比中國新文學更強烈反抗的政治主題，²²一般研究論者也習慣以政治姿勢切入台灣文學去論述，所以吳潛誠認為：「文學詮釋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對文學的研究會滲透政治意義，有時反而比純粹學術研究的影響還來得大。」²³有著合法統治權的日本一踏上台灣的土地開始，慣於械鬥的台灣民眾便激生出一種團結對抗的意識，隨著時間的消逝，許多台灣民眾陷入殖民情境的深刻效應中，在記憶與遺忘的複雜操作裡逐漸改變主體自我；不過還是有許多民眾藉著各種抗爭事件、漢文教育與文學運動形成潛在性的台灣意識認同。「認同」基本上是一種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兩個環節：一個是人自我反省、批判與解釋的能力；另一個是人對社群團體的歸屬感。²⁴不論是自我反省、批判與歸屬感，這種認同也成為日後台灣文學飽含著反抗精神的政治意義所在。

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對於黃石輝在一九三〇年打響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的名言絕對不陌生：「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經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健筆，生蕊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²⁵這段經典的話語屢屢被引來當成台灣意識的論證。其實早黃石輝三十年之前的王石鵬便說過類似的話：「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西人五尺童子，皆能明五洲萬國之俗、太陽地球之位；吾人生斯、長斯而不知斯地之事物物，亦可羞乎！」²⁶不論是文言文的「吾人生斯、長斯而不知斯地之事物物，

²¹ 董保中：〈我們當前的一些文藝問題〉，收入董保中：《文學·政治·自由》（台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10月再版），頁175—頁176。

²² 朱雙一：《近二十年台灣文學流脈——「戰後新世代」文學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一刷），頁72。

²³ 引自陳芳明：〈悲懷吳潛誠〉，收入陳芳明：《陳芳明精選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頁134。

²⁴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科學論叢》第八期（1997年6月），頁51—頁58。

²⁵ 黃石輝：〈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匯編》（高雄：春輝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一刷），頁1。

²⁶ 王石鵬：〈《台灣三字經》自序〉，收入王石鵬：《台灣三字經校釋》（台北：台灣書房出版公司，2007年7月二版一刷），頁2。

亦可羞乎」或白話文的「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都悄悄滲入身陷殖民地的台灣作家心中，雖然他們有人持續的抗爭、有人被關、有人隱身角落、也有人被收編，但一甲子後再重新解讀他們留下的書寫，文字的背後所流露出的訊息，彷彿是對六十年前的台灣殖民主發出不屑的嘲笑。

語言文字是文學的重要載體，所以每一種語言文字有其文化思想，當然也包含政治哲學與權力展現，亦即所謂的「要大眾有思想的批判力，要給他們自由驅使的語言」。²⁷這些觀點在一九三〇年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中，多少都已觸及，²⁸可見得語言文字的本身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曾有些論者否認「語言的阻隔」是本土作家在一九五〇年代缺席的因素，認為那只是人云亦云的成見。²⁹走過一九五〇年代的作家兼批評家祝豐（司徒衛）曾現身說法：「光復後本省籍作家少有作品發展，其一大因素是相當缺乏中文寫作的能力。」³⁰學習一種語言文字，不光只是學習符號，而是一整套背後的邏輯思考與文化觀念，從日文創作到中文創作，所經歷的不只是符號的轉換，還關係到思考模式的問題。鍾肇政也述說跨越語言的艱辛：「從學習祖國語文，到學習寫作，過程備極艱辛。他們原本腦子裡祇有日語，所以初初嘗試寫作時，均需以日文思考、起草稿，然後再自己來譯成中文。」³¹除了語言文字的問題，作為一個近代台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兩種身分的認同掙扎」。第一種身分的認同掙扎是在終戰之後，本土知識分子經歷大和民族主義（大和大敘述）的皇民化浩劫，又立即迎接高漲的中華民族主義（反共大敘述），這兩種主義是敵對的，去「日本化」再接受「中國化」事實上是一種「死亡與重生」的過程，因為接受中華民族主義的洗禮，他們就必須對過往的自己進行改造；倘若堅持大和民族的意識，那就無可避免遭到中華民族主義的批判。要求脫離五十年的台灣對日本產生絕然的仇恨或百分之百擁抱中國文化，事實上都有很大的障礙。第二種身分的認同掙扎是在國共內戰

²⁷ 洪耀勳：〈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匯編》，頁 248。

²⁸ 請詳參中島利郎編的《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匯編》一書，書中收集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敬〈台灣化文討論欄〉、郭秋生〈建設「台灣化文」一提案〉、小野西洲〈讀台灣話語改造論〉等篇章。

²⁹ 如尉天驄：〈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遷變與文化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 8 月初版三印），頁 455；龔鵬程：〈本土化的迷思：文學與社會〉，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1997 年 5 月初版），頁 1—頁 32。

³⁰ 祝豐：〈評「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遷變與文化發展》，頁 489。

³¹ 鍾肇政：〈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收入鍾肇政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台北：天視出版公司，1979 年 2 月初版），頁 9。

後，中華民族主義分裂成兩邊，形成兩岸各自的反共大敘述與共產大敘述，台灣的知識分子到底要認同哪一邊？從日治時代到二二八事件再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左翼思潮蔓延知識界，該回歸到神州大陸的共產體制批判台灣，還是選擇復興基地的黨國體制等待受批判？對於大敘述轉變的兩難抉擇與不斷游移，是位於時代夾縫中的一種悲劇。³²

日治時代受高壓統治所激發出具有殖民抗爭精神的小說其實是一種廣義的政治小說，所以台灣政治小說創作的第二階段創作潮，是日治時期富有反抗、反殖民的新文學運動年代。至於第三階段政治小說創作潮，是指一九五〇年初到一九七〇年末反共、戰鬥文學盛行的年代。歷經一九四九年的大動盪，國民政府帶著百萬軍民播遷台灣，「謀食萬里，歷盡心酸，其中實有可歌可泣、涵天地大悲痛大哀憫之故事。」³³對驚魂初定的他們而言，這塊狹小的空間只是海外暫時棲身地，因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便可光榮返鄉歸家。可是多年過去，依然被困在自由基地，心中那種哀戚非旁人所能理解。³⁴所以許多離鄉背井的外省人及年輕人紛紛加入創作的行列，他們用滿腔的反共熱忱與澎湃的懷鄉意識交織成一種大時代的哀吟，劉登翰卻認為那種反共、戰鬥文學「將文學逼到非文學的死角」³⁵。若能重回時代現場，在那種烽火連天、流離失所的歲月中，「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好像分不開了」，³⁶有幸來到台灣的人，在喘息初定之時，對倉皇辭鄉的因果全感茫然。敏感的文學心靈就好像在灰濛濛的曠野中奔跑，寫作是他們悲情的昇華，由彼端呼喊著家人的名字。³⁷就是這樣的環境，反共文學與懷鄉文學才能輕易地擄獲那一時代眾人的目光，且一再迅速不斷

³² 陳芳明：〈割讓是一時的，傷害是永久的〉，收入陳芳明：《危樓夜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頁99。關於大敘述的定義請參考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方法。

³³ 龔鵬程：〈本土化的迷思：文學與社會〉，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

³⁴ 陳三興曾述說當時一個可悲的故事：「讀初中時，有一位湖南籍國文老師，胖胖的、壯壯的。很抱歉，一時想不起姓名，只記得住在學校宿舍，有家眷，軍人出身。這位湖南籍國文老師教一年書，突然在暑假傳出自殺的消息。知道內幕的同學告訴我，校長下學期不續聘他，而且叫他立刻搬出宿舍。這位老師向校長求情再三，無效。逼使這位受學生歡迎的國文老師臥軌自殺。當時知道內情的學生私下埋怨校長太絕情，但沒採取任何行動。學校低調處理，由各班導師在課堂上通知認識他的學生去參加葬禮。」一位離鄉的知識分子突然之間又要失去暫時的棲身地，那種去國離鄉的思歸之心與一再遷徙的惶惶之情，經由一個「臥軌自殺」的行為透露出動盪時代的悲涼滄桑。請詳參陳三興：《少年政治犯非常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年2月初版一刷），頁116—頁117。

³⁵ 劉登翰：《台灣文學隔海觀：文學香火的傳承與變異》（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5年3月初版），頁60。

³⁶ 彭歌語，引自廖玉惠：〈談笑無還期的過客 引領一代風騷的彭歌〉，《人間福報》（2008年3月29日）週六版。

³⁷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灣文學五十年》（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頁209。

複製。至於將文學逼到非文學角落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兩岸的政治使然。

國民政府針對兵敗大陸進行全面反省檢討時，認為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失敗只是一時的，唯有教育的失敗影響巨大，教育的失敗，不只是學校教育的失敗，更主要的是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針和教育政策，即忽視了國家理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³⁸蔣中正總統自己也承認大陸失敗最大癥結「是在學校教育中，不注重生活教育和人格修養的教育」所致，所以青年必須「立定恢復大陸、拯救同胞的志節，負起反共抗俄、復仇雪恥、實現三民主義的責任，否則就不能算是一個現代青年了！」³⁹既然教育負有整合反共復國、三民主義與道德修養的職責，與教育最相關的文藝也就成了當權者掌控與改革的聚焦點。張道藩曾說：「優良的文藝，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社會教育。」⁴⁰就在國民政府強力執行下，以三民主義文藝、中國文化道統、反共復國精神所建構出來的反共大敘述，變成文壇的最高的指導原則，「消滅萬惡共匪、光復大陸國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必須團結」、「建設為反攻，反攻為復國」、「一切為反共，一切為勝利」、「軍民一條心，反攻大陸去」、「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等標語或主張，在日常生活周圍大量繁殖，讓反共大敘述成為時下所有國家象徵符號的大集合體。柯恩認為：「各種象徵符號主要是用來發展和維繫社會秩序，爲了要使各重象徵符號有效地運用，它們的社會功能必須要儘可能的停留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人在不知不覺中運用這些符號。」⁴¹在這些符號的運用下，反共愛國懷鄉的熾熱心靈不斷被鼓動，再配合文壇高亢文學運動如「戰鬥的時代，帶給文藝以戰鬥的任務」的「戰鬥文學」⁴²，反共文學、戰鬥文學與懷鄉文學終於成爲一代文學主流。這種文學「以爲文藝而文藝的傾向而論，這也是政治環境的產物，而且對政治有相當的影響，有時也是積極的，富有戰鬥性。」⁴³然而，文學的發展往往出人意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互動或影響也應細心爬梳。「(準)戰爭體制」⁴⁴所造成的長期戒嚴與嚴格

³⁸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11月初版一刷），頁406。

³⁹ 蔣中正：〈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並說明四維八德為反共抗俄鬥爭中的主要武器〉，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四演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10月出版），頁197—頁206。

⁴⁰ 張道藩：〈論文藝作戰與反攻〉，收入道藩文藝中心主編：《張道藩先生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頁106。

⁴¹ (美)柯恩 (Abner Cohen) 撰，宋光宇譯：《權力結構與符號象徵》（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4月初版），頁12—頁13。

⁴² 此為張道藩語，引自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7月二版），頁86。

⁴³ 王集叢：《文藝新論》，頁89。

⁴⁴ 一般將戒嚴時期的政治體制稱爲「極權政治」、「威權體制」或「獨裁政治」，在本文採用林果顯「(準)戰爭體制」的說法，詳細解釋請詳參第二章第一節前言。

監管，恐共、防共與滅共的激進手法導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產生，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期到一九九〇年代為止，因思想、言論涉及叛亂罪的政治案件多達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無辜受難者約達十四萬人，確知名字的受難者有八三〇二人，這些人從農民、小販到公務員、軍官、警察局長都有。⁴⁵這種嚴厲又恐怖的全面化控管，欲造就所有人口號、行動與思想一致，形成所謂「同質性社會」。⁴⁶而一九五〇年代中、後期陸續萌芽的現代主義文學、留學生文學或鄉土文學，雖然也名義上擁護反共且無意對抗反共戰鬥文學的主流地位，但這種迂迴的操作手法卻暗暗凸顯反共大敘述在文學流變中所無法掌控的變項。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諸多外交挫敗，總統蔣中正逝世、石油危機、通膨壓力等內政問題，都讓一九七〇年代走得並不順遂，隨之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是擦槍走火的預告一個新時代小說創作思潮的來臨。

第三階段政治小說創作潮，是鄉土文學論戰結束後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國民政府宣佈解嚴的這九年。據李瑞騰的觀察：「進入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高度發展，大眾消費社會形成，文學在出版產業中被包裝成商品；另一方面，社會逐漸多元化，各種言論禁忌被突破，弱勢者由禁聲到發聲，文學言論日漸開放，於是諸如邊疆文學論、台灣作家的定位問題、台灣文學論述的統獨論辯、台語文學論等隨處可聞，甚至於一種新的台灣民族文學觀也形成了。」⁴⁷文學思潮或文學類型皆有其生命週期，獨領風騷時無人能擋，至其末流時則弊病叢生，這是一種自然現象，也是文學輪番交替演變的正常過程，所以「反共文學」、「戰鬥文學」、「懷鄉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閩秀文學」、「都市文學」、「愛情文學」、「山水海洋文學」都有它們的繁盛、演變與終結。魏子雲曾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時代的因素上說，還算不得是一個遠去的時間，但在世事的變化上，可就遠了。特別是作家與作品，有的曾連年獲獎，有的亦曾風靡一時，竟居然在十年廿年之後，已不再被人提起。」⁴⁸反共、戰鬥與懷鄉文學的逝去，象徵著一代政治小說的終結，雖然一九八〇年代尚有作家創作反共、懷鄉文學，不過已無法與都市小說、校園小說、女性小說、環保小

⁴⁵ 請詳參黃國樑、林修全：〈政院白色恐怖受難者 超過 20 萬〉，《聯合晚報》（2007 年 7 月 11 日）2 版；羅紹平：〈綠島人權展 解析白色恐怖〉，《聯合報》（2009 年 7 月 9 日）A6 版。關於匪諜冤獄案，請詳參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年 3 月初版二刷），頁 533—頁 548。

⁴⁶ 關於同質性社會與異質性社會請詳參第一章第四節名詞界定。

⁴⁷ 李瑞騰：〈評論的觀察回歸歷史脈絡〉，《聯合報》（1998 年 3 月 25 日）41 版。

⁴⁸ 魏子雲：〈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收入魏子雲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台北：天視出版公司，1979 年 2 月初版），頁 6。

說等相抗衡，而受人注目的「政治小說」也順勢再起。一九八三年後，李喬正式倡導「政治小說」，不但以《台灣文藝》為園地鼓勵作家發表，也和高天生一起編輯《台灣政治小說選（一）》，展現日治以來一脈相傳的創作傳統。⁴⁹第三期政治小說的興起因素據周芬伶的歸納有四點：一是政治現實的波動，二是政治受難者的控訴，三是文學性副刊的影響，四是小說家尋求認同。⁵⁰除了這四點之外，報章雜誌主編的提倡也是一個具有影響的因素。

發生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其說是工農兵文學、分裂族群情感或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碰撞，倒不如說成是反共大敘述在轉變的時代中無法融入與消滅異質所產生的現象。這個鬆動現象不但導致文學發展產生了重大改變，也讓許多作家興起挑戰威權的想法。一九七九年是台灣處於外交邊緣化、兩岸緩和化、政治民主化與社會複雜化的關鍵時刻，從元旦開始中共人大的〈告台灣同胞書〉便拋出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台灣關係法」、到美麗島事件的震驚國際，無一不牽動著國民政府最敏感的神經，這也讓日後當權者不斷藉由反共反分裂的行動來鞏固領導中心。不過消費年代的來臨，所有的生產事業不再從反共面來著眼，市場的需求、供需的導向、民眾的收入提高與國民教育的普及導致生產模式與社會結構漸漸不同，政論雜誌的前仆後繼、報紙的箝制慢慢放鬆、黨外人士的得票率越來越高，這些因素啟迪著群眾往民主的需求邁進。再加上那幾年社會上一連串發生一些引起大家注意和談論的事，像十信案、江南案、核四廠問題、中醫師考試洩題事，以至於遠航機械故障等；事實的情形和可能損害的範疇與大小都不相同，但從社會流傳和反應的表象看來，基本上，共同的都反映出社會大眾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⁵¹一些鄉土文學作家、不願受支配的新生代作家與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也在這種氛圍中以更大膽的觸角伸入禁忌地帶，藉由政治事件、監獄生活、現實議題，讓文學與當下做更緊密的結合，以彰顯現實環境的政治現象或尋找被遺忘的歷史真相。黃恆秋說：「政治現實的反應對台灣文學作家來說是無法避免的奮鬥，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政治氣氛是相當詭異的，若干政治禁忌的突破關聯著政論刊物的此起彼落，言論空間有擴大的趨勢，作家被捕入獄並延伸為作家參政的翻騰，有的是對舊官僚體系的抨

⁴⁹ 這時候興起的政治小說是屬於一般論者所謂的「狹義的政治小說」。周芬伶認為「狹義的政治小說」指的是解嚴前後出現描寫當代或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小說。請詳參簡定恩、周芬伶等：《現代文學》（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1999年8月初版三刷），頁307。

⁵⁰ 簡定恩、周芬伶等：《現代文學》，頁311—頁312。

⁵¹ 《聯合報》1985年4月30日社論：〈消弭社會大眾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收入楊選堂主編：《聯合報與國家現代化：聯合報創刊四十年來社論選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9月初版），頁715

擊，有的是傾向反對運動的思索。」⁵²由於反共的迫切性持續衰退，第三階段政治小說的光譜，對於當權者抨擊的文本不論是質或量，皆多過於對當權者擁護的文本（反共小說），所以這階段所指的政治小說通常是針對抨擊現況或禁忌的文本而言。在政治小說探索禁忌的界線時，往往也因越界而遭受當權者強制性權威的禁制，如施明正《島上愛與死》與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一出版便遭禁、王拓《牛肚港的故事》因故無法刊登、其《台北，白北！》無人敢出版、劉大任、陳芳明因黑名單身分書被禁等等，⁵³甚至與原住民有關的《春風詩刊》第一集也在問世時，即遭警備總部查禁。⁵⁴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高準已高呼：「對於任何一種著作的禁止，是一件重大的事，必須要有嚴謹、光明、正大、公開的理由，否則，必將反在人民心上投下陰影。我們既不應該因為作者身處敵對政權統治之下就要不問其著作內容而加以禁止，也不應該以人廢言的認為凡有錯誤的人一切言論著作都要不得。更不應該只因為其人曾經批評政府就禁止他一切著作。」⁵⁵挑戰的意義在於突破禁忌，失敗就是被禁制，若成功則象徵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一九八〇年代最大的禁忌突破應屬「政治犯書寫」與「二二八事件」的浮上檯面，⁵⁶許俊雅認為：「『二二八』一詞遂成為象徵台灣集體命運的一個悲劇符號，它造成台灣知識分子亡命天涯，遠走異鄉；文藝工作者不敢關懷現實，仗義直言，文學喪失了自尊、自信；也促長了日後台獨意識和反對運動。作為台灣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二二八造成了在族群認同上符號系統的逆轉——經歷二二八所代表的殺戮和侵奪，使得中國轉而為壓迫的『他者』。在閃亮的長槍刺刀前，大部分的人噤聲了，屬於台灣人的故事，迅即退隱到歷史的暗角，被忙碌川流的後人遺忘，直至時序進入八〇年代，終於有人重塑人們的歷史記憶，將一個被湮沒的理想，一個最嚴峻、鮮血淋漓的時代，歷歷如繪展現在我們面前。」⁵⁷這一個歷歷如繪也

⁵² 黃恆秋：《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台北縣：客家台灣文化藝術基金會，1998年6月初版），頁161—頁162。

⁵³ 劉大任的《浮游群落》完成後由於身分敏感的關係，只能在香港與海外出版。第一次在台灣面世，是靠康寧祥冒險在《亞洲人》雜誌上刊登；後來幫忙出版單行本的遠景出版公司負責人沈登恩，還曾遭到警備總部約談。請詳參劉大任：〈《浮游群落》後記〉，收入劉大任：《浮游群落》（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10月初版），頁384。

⁵⁴ 關於1984年3月《春風詩刊》第一集「獄中詩專輯」遭禁原由，請詳參楊渡：〈讓原住民用母語寫詩——莫那能詩作的隨想〉，收入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下）》（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年4月初版），頁9。

⁵⁵ 高準：〈論中國現代詩的流變與前途方向〉，收入高準：《文學與社會改造》（台南：德華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頁36。

⁵⁶ 朱雙一認為開始叩啟政治敏感大門的是「牢獄小說」，再來是「二二八小說」，再來才是「人權小說」。請詳參朱雙一：〈現實批判精神向政治領域的掘進〉，收入劉登翰、莊明萱主編：《台灣文學史》第三冊（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一版一刷），頁58—頁62。

⁵⁷ 許俊雅：〈從困境、求索到新生——談台灣新詩中的二二八〉，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台

將日治時代以來的台灣文學與反抗精神逐漸形塑成族群意識的台灣民族觀。所以就文學角度而言，追求社會公義的政治改革與增進群眾進步的教育教化都是文學運動的重要目的，政治改革與教育教化能為文學運動創造適當的環境與條件，而文學運動則可為創造出新政治體系的精神力、號召力和動員力。陳映真認為自「二次大戰後，從《自由中國》時代一直到《台灣文藝》改組之前，台灣的文學基本上和黨外的民主化運動無關」，不過，應鳳凰則認為從深層處看到「不論現代主義文學或鄉土文學，都與四十年來台灣社會的民主化相關。」⁵⁸這也就說明台灣文學運動與政治發展的緊密關聯性。至於和民主化的關聯，最明顯的例子是政治文學挑戰大敘述的年代，其異質性的發聲與政治、社會運動的脈動結合而產生抗拒同化的力量，當同質化的社會越來越多異質化聲響，民主多元化的現象便可能發生。論者常以文學多元發展來表彰一九八〇年代的文學發展，不過這種「歷史的多元性，不僅來自社會中的不同記憶機制，國家歷史的宰制所引起的抵抗或階級間的對立等，均可造成歷史的多元性。」⁵⁹可見多元化往往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國家歷史的宰制所引起的對立，或諸多異質對同質性社會所產生的抵抗與回應所造就的。

約翰·蓋蘿莉（John Guillory）認為：「文學典律的運作，甚至主流文學的興起，最重要的不是作家的特定身分，或者是優異品的產生，而是文化生產消費管道的資源分配問題。」⁶⁰所以政治小說也會隨著權力運作與文化生產而產生變化，甚至散入各種類型小說之中。其實這種政治力的介入不只表現在政治文學上，連一九八〇年代政治力的介入的女性文學也有這種跡象，⁶¹解嚴前被稱為「間接介入當時國家敘述的衝突，附和黨國的國家想像」⁶²的閨秀之作，在解嚴後竟然轉

灣文學與社會：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1997年5月初版），頁331。

⁵⁸ 一九八三年陳映真接受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訪問與應鳳凰的論點，請詳參應鳳凰：《〈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史》，《文學台灣》26期（1998年4月），頁236—頁269。

⁵⁹ 黃應貴：《人類學的視野》，頁75

⁶⁰ 引自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7年9月初版一刷），頁46。

⁶¹ 雖然社會性別關係結構的改變、女性同胞紛紛投入職場、女性消費群的比例大增等都是女性文學興盛的因素，不過邱貴芬認為：「一九八〇年初台灣女性文學當道，並非無中生有，與既有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壇生態布局毫無關係。被鄉土文學論戰的高度政治辯論壓得透不過氣來，求取政治之外的文學題材固然是『張愛玲風』興起的部分原因，美麗島事件之後的肅殺政治氣氛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是，從深層的意義面來看，『張愛玲風』未嘗不是鄉土文學論戰所牽涉的意識形態之爭的延續。」（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頁27）楊照也認為「張愛玲風」的傳承「三三集刊」：「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對鄉土文學，企圖創造一個以大中國文化為中心的行動原則的努力。」（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年9月初版），頁152）

⁶²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頁47。

變成只屬於女性主義的政治書寫與家國想像，甚至也試圖參與當前重寫台灣文學史的論述。⁶³所以解嚴後至今的第四階段政治小說創作潮，除了繼承政治小說的特色外，也涉入了文化生產與資源分配的政治遊戲。就如邱貴芬所言：「文學經典形成過程其實牽涉到種種權力運作。眾多有關典律的深入探討提醒我們，閱讀和寫作都是種社會活動，受制於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體制化遊戲規則。一部文學作品是否能順利出產、引起大眾消費興趣、甚至流傳千古的，並不單單取決於美學標準而已。」⁶⁴

後蔣經國時代是強人政治與（準）戰爭體制的結束，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也紛紛修正，海峽兩岸的關係進入新階段，台灣的政治型態開始大轉變，配合原本就已復甦的社會力，產生了更躁鬱的面相。外匯存底的急遽上升、電子產業的異軍突起、消費能力的不斷攀升，象徵著潛力無窮的經濟成長力；但是股市和房地產的暴漲、大型企業的逐漸外移與產業再升級的延遲，同樣也暴露出體質不良與亟需改革的問題。隨著解嚴的開放，沉潛於歷史深處的機密文件開始解密，於是乎屹立四十年的反共大敘述轟然崩潰，許多依傍而生的群眾開始手足無措，王德威認為：「當歷史秩序崩頹，政教機構解體的時候，文學被視為重組回憶，救贖理性的重要手段。歷史與虛構間的軛轡，文字與意義間的遊戲，都暫時存而不論。」⁶⁵為了重組回憶，也為了者回自我，探索歷史真相、追尋國族與身分認同、強調台灣意識、抗拒台灣意識等論述紛紛出籠，也讓台灣正式進入分眾的時代。余光中曾說：「解嚴已有兩年，關懷政治的作品卻也未見轉盛，因為這樣的作品要把意識形態提升為藝術，並非易事。同時，在言論禁忌的時代，此類作品難以刊登，但是到了百無禁忌的時代呢，壓力既除，反彈力也相對減弱了。」⁶⁶余光中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應是政治小說再也無法將政治書寫攬為己有，各種立場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散入不同文類如自傳、口述歷史、報導文學、學術研究之中，形成一種後現代文學的景觀。林美容認為台灣的一九九〇年代應該是一個全面覺醒的年代。⁶⁷新覺醒與新文化造就出的族群意識在相互競爭、相互排擠下，紛紛提出論述，不但有重新面對過去的勇氣，也有大膽跨越未來的衝動，雖然亂象紛呈，也未必準備好了，卻是幾十年內最衝勁十足的時候。不論是明清時代、日治時代、

⁶³ 「試圖參與當前重寫台灣文學史的論述」是張聖誦對李昂《迷園》的評論。請詳參張聖誦：《文化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頁152。

⁶⁴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頁18。

⁶⁵ 王德威：〈千年之淚不輕彈：由齊邦媛教授的「千年之淚」談起〉，《聯合報》（1990年8月8日）29版。

⁶⁶ 余光中：〈三百作家二十年〉，《聯合報》（1989年5月9日）21版。

⁶⁷ 林美容：《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二刷），頁51。

反共時代的文學皆全面重新反省，文學史的建構與權力的爭奪也暗潮洶湧。

歷史常常開文學的玩笑，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張大春、陳若曦不喜歡被稱為政治小說家，偏偏他們所創作的政治小說都是文學精品。⁶⁸日治時代有些知識分子處處偽裝、做事陽奉陰違，這種殖民情境下可以理解的偽裝性認同竟也發生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解嚴後一些本土作家公開卸下長期的偽裝，然後高舉台灣意識大旗；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批判「鄉土」最猛烈的作家，解嚴後也透過文字出來告白；⁶⁹許多創作過反共文學的作家，也在文學史逐漸正視反共文學地位時，卻反而將反共、戰鬥作品束諸高閣。⁷⁰張大春在大陸由莫言編選的中短篇小說選集《歡喜賊》，裡面除了〈飢餓〉以外，其他如〈四喜憂國〉、〈將軍碑〉等重要的政治小說就是沒選入；⁷¹相較之下，陳映真在大陸由趙遐秋等人編選的短篇小說選集《歸鄉》，卻選入〈山路〉、〈鈴鐺花〉、〈趙南棟〉、〈歸鄉〉等政治小說。⁷²在強勢文本迅速興替、海峽兩岸政治進入另一種關係、發言權已不再由官方掌握的今天，以上諸多情形到底說明了什麼現象？據沈萌華估計，民國七十年台灣一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近三千篇，⁷³由此推算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間的長、短篇小說量遠超過三萬篇，而近百篇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佔不到其中的三百分之一。如果再縮小範圍，只從純文學角度著手，據陳明柔的資料估計，這九年間的長、短篇小說量約有兩千六百篇左右，⁷⁴政治小說也只

⁶⁸ 劉紹銘：〈拓展「美麗的新世界」〉，《聯合報》（1984年11月18日）8版；連甫：〈越洋電話訪問陳若曦 縱談社會文學和生活〉，《聯合報》（1977年11月4日）3版。

⁶⁹ 關於日治時代知識分子偽裝性認同，請詳參李筱鋒：《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年10月初版一刷）一書。本土作家鍾肇政等公開承認偽裝認同國民黨之事請詳參鍾肇政口述，彭瑞金總編輯：《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8年7月初版）一書。解嚴後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種種，1991年朱西寧最早站出來告白，指責當年的主政者蔣家對於文人之箝制，並述說他寫作時的對應之策，請詳參朱西寧：〈被告辯白〉，《中央日報》（1991年4月12日）16版；余光中遭大陸學者為文譴責後，於2004年9月11日《羊城晚報》發表一篇〈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認為自己失心瘋的指責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原文收入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10月初版一刷），頁80—頁86；對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言論彭歌認為：「也不是說後悔，就是照現在的想法，就讓別人去談吧！」引自廖玉惠：〈談笑無還期的過客 引領一代風騷的彭歌〉，《人間福報》（2008年3月29日）週六版。

⁷⁰ 如朱西寧的作品不斷翻印，就是獨漏《大火炬的愛》；張秀亞反共愛台、政治正確的小說〈三代〉、〈訣〉、〈耶誕樹的故事〉、〈如願〉等，也都沒收入《尋夢草》和《七弦琴》等書，請詳參范銘如：《像一盒巧克力——當代文學文化評論》（台北縣：印刻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初版），頁190。

⁷¹ 張大春：《歡喜賊》（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1月一版一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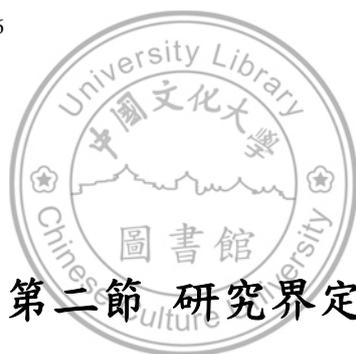
⁷² 陳映真：《歸鄉》（北京：崑崙出版社，2001年4月一版一刷）。

⁷³ 沈萌華：〈獨憐幽草潤邊生：編序〉，收入沈萌華編：《七十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4年4月六版），頁2。

⁷⁴ 陳明柔：《典範的更替／消解與台灣八〇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台中：東海大學中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頁344—頁438。

佔了其中不到二、三十分之一的量。這些量少的政治小說會在一九七〇末到一九八〇年代末的文學上佔著顯著的位置，自有它們過人之處，也是引起筆者研究的最主要動機。

政治與歷史是複雜的，由不同的時段與不同的面向切入，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政治小說在不同歷史階段，也被賦予不同的功能和意義，於是一次又一次的權力支配、干預、協調與流動，生產出屬於那個世代的理念實踐與生活聯繫。吳乃德認為：「時間會模糊我們對去過殘酷壓迫的記憶。」⁷⁵所以，藉由書寫與傳播，群眾的意識就一次又一次的被喚起；經由政治事件的動員，群眾自身便一波又一波被組合起來，過往的歷史也慢慢建構成日常生活裡的當下歷史。只有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痛，不少政治小說是記錄痛的感覺，因為意識形態的召喚，它似乎泯除其他無關痛癢的旁觀者，讓記憶存留在閱讀者已遺忘的心海中。至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像齊邦媛所言：「因為文學的終極關懷絕不該是支配性的政治，而是心靈的處境和人性的趨向。只要有此關懷與藝術造詣，作品才能在時間的淘汰下傳諸後世。」⁷⁶



本論文研究範圍的界定如下：

一、大敘述

「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一詞在台灣文學批評中常常見到，有人翻譯成「宏大敘述」、「大歷史論述」或「正統敘事說法」⁷⁷，例如：

⁷⁵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收入思想編輯委員會：《歷史與現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6月初版)，頁22。

⁷⁶ 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台灣文學五十年》(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頁214。

⁷⁷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稱之為「宏大敘述」；呂大樂在《唔該，買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頁32—頁38)稱之為「大歷史論述」；羅青翻譯《後現代狀況》(法)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撰，羅青譯：《後現代狀況》，收入羅青：《後現代主義是甚麼》，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8月二版二刷)稱之為「正統敘事說法」，在本論文中一律稱之為「大敘述」。

王德威：「二十世紀的中國不缺離散的故事，但這批老兵所演義的歷史荒涼處，仍然讓我們怵目驚心。我所指的離散不只是指家國的破碎，此身的飄零——那仍然是國家『大敘述』的一部分。」⁷⁸

曾萍萍：「回溯『大敘述』涵蓋之下的台灣，由於人們往往無法扳倒發布錯誤決策的國家建構體，為求生存，邊緣者拼命往中心推擠，悲慘的命運於是展開。」⁷⁹

陳芳明：「在權力的支配下，知識分子對於歷史記憶的重建，以及對於文學遺產的整理，都無法避開傾向『大敘述』的思考方式。」⁸⁰

何明娜：「張大春的〈將軍碑〉，以史實入文本讓歷史產生虛構的發酵作用，挑戰與顛覆歷史『大敘述』。」⁸¹

王鈺婷：「女作家介入『大敘述』，與威權統治大相逕庭的創作次第展現。」⁸²

王斑：「『宏大敘述』的消退並不能斬斷歷史，相反，歷史感的退隱更加強化了重新命名和界定人們與過去的關係的需要。」⁸³

陳瀛州：「我們可以看到『世界華文文學』論述已經逐步深化到世界各地，往昔的華裔文學包括馬華、新華、菲華、泰華、汶華、越華、印尼華文文學、亞洲華文文學等等都被『華文』一詞吸納，而逐步建構成鐵板一塊的『宏大敘述』。」⁸⁴

⁷⁸ 王德威：〈老去空餘渡海心〉，收入齊邦媛、王德威編：《文學關懷》（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年3月初版一刷），頁10。

⁷⁹ 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3。

⁸⁰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入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年4月初版一刷），頁132。

⁸¹ 何明娜：《張大春短篇小說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年），頁24。

⁸² 王鈺婷：《身體、性別、政治與歷史》（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8年12月初版），頁27。

⁸³ 王斑：《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頁139。

⁸⁴ 陳瀛州：《七〇以降台灣現代詩論戰之話語研究》（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8年12月初版），

上列論述中，「大敘述」之上往往冠上黨國、中國、台灣、殖民、國家等語詞，卻沒有做嚴格的界定。本文的「大敘述」是依法國思想家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理論為主，他曾接受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諮詢委員會的委託，於一九七九年完成並出版當代文化和知識變化的研究所計畫書《後現代狀況：有關知識之研究報告》，一九八四年推出英譯本後震驚世界。李歐塔認為所有的論述都是敘事，歐洲啓蒙運動以來的求真精神與自由解放精神，成為現代傳統敘述的合法根基。而這求真精神與自由解放精神漸漸演變成兩套「大敘述」：第一種「大敘述」是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獨立解放思考模式（中國辛亥革命受法國革命的影響，因此中國國民黨的「大敘述」——即本論文之「反共大敘述」——屬於此類）；另一種「大敘述」是以德國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辯真理（馬克斯主義深受黑格爾影響，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大敘述」屬於此類）。⁸⁵隨後，新興的科學也慢慢建構出「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一種獨自的科學語言策略競賽。進入後現代之後，大敘述的合法性、獨立性或統合模式都遭受質疑，因為不再具有可涵蓋一切語言策略競賽或特權的論述。⁸⁶大敘述的面臨崩潰，使得後現代有機會尋求多元的而非統一的歧異，也由於肯定歧論而使得所有人都能發言，形成小敘述林立的現象，這即是李歐塔認為的「現在應被強調的是異議而非共識。」⁸⁷在「戒嚴時代」的台灣，⁸⁸國家權力機構密布，反共意識與三民主義文藝理論衍伸出來的知識也隨之無遠弗屆的散播出同樣的價值觀念、同樣的情感經驗、同樣的歷史背景，形成被國家牢牢支配的普遍共識。這種共識從追求「普遍一致」的正面意涵，到具有「比較緩和的」或甚至於是「潛意識的同意」這個意涵，到具有一種「操控式」的政治意涵，其目的是要塑造一種「沉默的大眾」作為權力的基礎，

頁 358。

⁸⁵ 這兩套大敘述是黎活仁的說法，請詳參黎活仁：〈新詩的雜文化——戴天詩的大敘事〉，收入黎活仁、龔鵬程編：《香港新詩的大敘事精神》（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9年3月初版），頁115—頁120。

⁸⁶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Language Game深受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響，羅青翻譯成「語言策略競賽」，有人翻譯成「語言遊戲」或「語言賽局」，本論文從羅青的翻譯。以上所有李歐塔思想請詳參（法）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撰，羅青譯：《後現代狀況》，收入羅青：《後現代主義是甚麼》。

⁸⁷ （法）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撰，黃宗慧譯：〈後現代狀況〉，收入（美）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謝德門（Steven Seidman）編：《文化與社會》（台北：立緒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2月初版六刷），頁406。

⁸⁸ 台灣曾三度發布戒嚴令，1947年二二八事件戒嚴、1948年12月10日〈接戰地域戒嚴令〉、1949年5月19日〈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5月20日開始台灣成為接戰地域），其中以第三次〈台灣省戒嚴令〉實施最久，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嚴。請詳參薛化元編撰：《自由化 民主化：台灣通往民主憲政的道路》（台北：日創社文化事業，2006年10月初版一刷），頁58。

以排除或壓抑反對運動、不同的聲音。⁸⁹所以蕭義玲曾將「大敘述」定義為：

所謂的大敘述，是一套促使國家文化政策自身合法化的政策，其身分之合法在於他是正統的真理，在這方面三民主義文學論無疑地扮演著極端重要的角色，它負責一種意識形態的調控工作，它的敘述策略衍構成大敘述之核心。以大敘述為中心輔以禁書、高額獎金等措施構成戒嚴時期國家文化政策的大致輪廓。⁹⁰

知識的取得脫離不了國家與權力，知識嚴密聯繫著與國家權力相關的文化傳統、歷史記憶、文學遺產、價值觀念，透過知識傳播與擴散的管道，國家變成一種論述，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⁹¹這也是大敘述得以形成傳統影響社會的原因。二次大戰後的去殖民與去帝國運動快速地被冷戰體制所攔截，到八〇年代以後冷戰開始鬆動，並成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條件時，去殖民才找到出發的生機，開始凝聚與散放之前被壓抑現在得以重返的力量。⁹²當時的台灣在這股全球的去殖民氛圍中政治文學配合著政治運動，終於逐漸鬆動戒嚴體制，挑戰大敘述的合法化與專一化。正如龍應台所言：「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⁹³在華文世界的兩「大敘述」，亦即「反共大敘述」與「共產大敘述」隨著國共戰爭到兩岸分治始終相互批鬥著，江宜樺認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只是用來與中共作政治鬥爭，並不想激起反日反美的情緒。……拿來對付台獨完全是近十幾二十年來的事。」⁹⁴所以一九五〇年代之後，反共小說與反共大敘述所代表的立場，維持著認同或維護的定向關係；而其餘文學創作多與反共大敘述保持擁護但不親近、支持但不比照辦理的態度，直到挑戰大敘述政治小說興起

⁸⁹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撰，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5年10月一版二刷)，頁83—頁84。

⁹⁰ 蕭義玲：《台灣當代小說的世紀末圖象研究——以解嚴後十年(1987—1997)為觀察對象》(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8年)，頁38。

⁹¹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入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131。

⁹²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年10月初版)，頁7。

⁹³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收入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7月初版一刷)，頁108。

⁹⁴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0年4月初版三刷)，頁145。

之後，才有所改變。所以綜上所述，本論文對於反共「大敘述」的定義如下：

以繼承中國文化道統、完成辛亥革命目標、奉行三民主義精神、光復大陸神聖國土為合法且唯一的論述，並藉由日常生活、傳統節慶、歷史記憶、國民教育、語言文字書寫與道德價值觀念實踐出來的官方政策。

而政治小說「挑戰大敘述」的行為即以抵中心、反中心、去中心的政治姿態抗拒或消融上述的反共「大敘述」。

二、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

政治小說常以當下的政治事件或現狀為素材，而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1979—1987）所呈現的內容卻多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這除了有書寫親身經歷或聽聞的因素之外，也說明白色恐怖時代的題材的確讓作者有更多突破與發揮的想像空間。

國民政府播遷之後的第二期政治小說創作潮大致與世界性「冷戰時期」雷同，陳光興認為冷戰時期是「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帶來的不只是韓民族內部的殘殺，也使得南北韓成為分割國家，到了一九五六年韓戰結束，全球的冷戰結構性在東亞確立。冷戰結構將東亞區域分隔了二十年，直到七〇年代末，中國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才鬆動互為禁區的格局。」⁹⁵由於台灣戰略地位與國共戰爭的關係，韓戰爆發時已隱約成為美國防堵共產擴張的陣線，這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反共、戰鬥文學開始盛行的時候，到冷戰末期美國與中國建交，冷戰時期格局逐漸改觀，台灣也因外交挫敗、選舉日益擴大和鄉土文學論戰影響而逐漸激起知識分子真正思考台灣的命運何去何從。是以本論文選擇以下兩個影響日後台灣走向的年份做為研究的範圍。

（一）起始的一九七九年是一個特殊的年分⁹⁶，不論是在政治上或文學上。這一年是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三十週年，也是《戒嚴法》實施三十週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與美國斷交後的第一年，也同時是中共與美國建交年；是中共停止砲擊海峽兩岸進入另一種對峙形式的第一年，也是中共人大發表〈告台灣同

⁹⁵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的方法》，頁 11。

⁹⁶ 季季：〈站在相同的轉捩點——「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編選序言〉，收入季季編：《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公司，1988 年 8 月新版三刷），頁 9。

胞書)的特殊年；是美國第一次舉辦台灣文學研討會，也是中共文學刊物《當代》首次刊登台灣文學作品的第一年；是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自動失效的第一年，也是一九七九年年四月十日與美國簽訂《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第一年；是戒嚴制度下爆發最受國際矚目的美麗島事件年，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鍵年；是新台幣發行三十週年、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三十週年；是自覺農村與土地問題日益嚴重關鍵年、也是大型經濟犯罪頻傳關鍵年；是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三十週年，也是鄉土文學論戰落幕後一年；是遠景出版《台灣文學全集》與明潭出版《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第一年，也是天視出版《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年；是鄭清文〈三腳馬〉與黃凡〈賴索〉發表年，也是李喬《寒夜》完成年。所以宋澤萊認為：「一九七九年後的連串事件，在未來的台灣文學史上絕對是十分重要的，在那一刻被劃了一刀，歷史的血脈迸開，文學的作家第一次發現，文學竟不是用置於案上的墨汁去蘸寫，而是用拋灑在社會、土地的血漬去蘸寫，個人主觀退出了文學，而代之以人們奔躍間的呼號。」⁹⁷陳器文認為：「一九七九年美麗島政治事件爆發，對台灣族類意識的發展是一個關鍵性的進程。」⁹⁸王德威談論文學與政治時也說：「我的討論最後一個時間出發點是一九七九年。之前一年，鄉土文學演變成一個政治抗爭的活動，而在最後一刻被喊停了。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對台灣是一大政治打擊，我們也看到美麗島運動第一次挫敗，更看到許許多多作家，為他們的政治理想而付出身體的代價。」⁹⁹

(二) 結束的一九八七年更是一個關鍵的年分，台灣社會、政治環境歷經前所未有的動盪。¹⁰⁰是廢除長達三十八《戒嚴法》的自由年，也是總統蔣經國逝世的前一年；是開放大陸探親的人道年，也是電影出現大陸風光畫面的第一年；是「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也是台獨聯盟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與「台灣筆會」成立第一年；是國民生產毛額(GNP)超過三千美金的突破年，也是停售「愛國獎券」的賭博年；是教育部髮禁的解禁年，也是自立救濟頻傳的起始年。所以郝譽翔認為：「對本省族群而言，一九八七年是台灣的新生；但對外省族群

⁹⁷ 宋澤萊：〈呼喚台灣黎明的喇叭手——試介台灣新一代小說家林雙不並檢討台灣的老弱文學〉，《台灣文藝》第98期(1986年1月)，頁44。

⁹⁸ 陳器文：〈台灣文學的運動性格〉，收入徐照華等：《台灣文學研習專輯》(台中：國立台中圖書館，1999年8月出版)，頁262。

⁹⁹ 王德威主講：〈文學與政治——小說的世紀、政治的世紀〉，《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一期(1999年9月)，頁141。

¹⁰⁰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聯合報》社論：〈為社會變遷找目的，替社會運動找出路〉，收入楊選堂主編：《聯合報與國家現代化：聯合報創刊四十年來社論選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9月初版)，頁999。

而言，卻可能是國族信仰淪喪的起點。」¹⁰¹許俊雅認為：「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以後，『二二八』不再是不可觸及的禁忌。」¹⁰²蔡德本認為：「因著戒嚴令和叛亂條例的廢止，終於能講述白色恐怖時代獄中之事。」¹⁰³胡泉寅認為：「無可諱言的，民國七十六年是我們國家建設發展的豐收年，不管是政治、經濟、文教或社會，都是劃時代的一年。」¹⁰⁴陳芳明認為：「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台灣知識分子才能夠在稍無恐懼的狀態下面對自己的歷史。」¹⁰⁵徐桂峯認為：「一九八七年是國內變革最多的一年，歷經了四十年來政情最急遽的蛻變。儘管這一年在自立救濟、示威遊行的抗議聲中推動著政治改革，但所獲得的成就，超過以往四十年的總和。」¹⁰⁶陳器文認為：「一九八七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台灣的威權統治色彩減輕，文學生態也隨之改觀。」¹⁰⁷杜國清認為：「台灣文學的研究是海峽兩岸在持續三十年的嚴峻對峙之後，由中國大陸基於政治的考量，採取開放政策，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而開始積極推動的。一九七九年七月大型文學刊物《當代》創刊號上首次發表白先勇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艷〉是這一趨勢的濫觴，至今已有十五六年。台灣方面也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開始應對，積極加強對台灣文學本身的關注和研究。」¹⁰⁸

三、政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也是指「我們整個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以及其中牽涉的權力關係。」¹⁰⁹布魯（J. H. Plumb）認為：「政權一旦建立，必定要建構一個安全而有助穩定的過去。」¹¹⁰因為變化的社會中，使得國家政治或社會上

¹⁰¹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文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東華人文學報》第三期（2001年7月），頁255。

¹⁰² 許俊雅：〈小說中的「二二八」〉，收入許俊雅編：《無語的春天——二二八小說選》（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3年9月初版一刷），頁4。

¹⁰³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台北：遠景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頁477。

¹⁰⁴ 胡泉寅：〈繼志承業反共救國〉，收入中央通訊社編：《一九八七年世局的回顧與展望》（台北：中央通訊社，1988年3月出版），頁9。

¹⁰⁵ 陳芳明：〈殖民歷史與台灣文學研究——讀陳昭瑛《台灣本土化運動》〉，收入陳芳明：《危樓夜讀》，頁131。

¹⁰⁶ 徐桂峯：《台灣集會遊行十年記事》（台北：自立晚報社，1989年3月初版），頁21。

¹⁰⁷ 陳器文：〈台灣文學的運動性格〉，收入徐照華等：《台灣文學研習專輯》，頁262。

¹⁰⁸ 杜國清：〈台灣文學研究的國際視野〉，收入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編：《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出版，1997年5月初版），頁1。

¹⁰⁹ （英）伊果頓（Terry Eagleton）撰，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頁243。

¹¹⁰ 布魯（J. H. Plumb）之語引自（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撰，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頁217。

統治階層的傳統統治型態越來越滯礙難行，或根本就行不通了，因而要用新的方法治理或建立高度的忠誠才行。就事物的性質而言，人為發明的「政治」傳統，所造成的效果比起其他方面的傳統更為自覺，也更易於傳播，因為這類的傳統以既有的習俗為外衣，內含其真正的政治目的。¹¹¹

本論文的政治概念會以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學說為中心。他認為政治造成了最劇烈、最極端的對抗，而且每一次具體對抗的程度越接近極點，即形成「敵——友」的陣營，其政治性也就越強。而且任何宗教、經濟、道德、種族或其他領域的對立，其尖銳到足以有效地把人類按照敵友劃分成陣營時，便轉化成了政治對立。所以一旦非政治性的對立變成政治性的對立，它就會令那些迄今為止仍然是「純」宗教、「純」經濟或「純」文化的準則和動機服從眼前政治局勢非理性的條件和結論。¹¹²所以「衝突」（conflict）¹¹³的對立成了政治性強烈與否的重要指標，不論是政治衝突、文化衝突、社會衝突、地方衝突、階級衝突、思想衝突所衍生出來的政治性對立，往往是政治小說取樣的重點。

四、政治小說

周寧認為：「小說常常形成兩種層面來反映現實。一種是前瞻性的，帶有預言的成份，小說家依恃銳利的知覺，警悟到社會層面的變化，而提出警告；一種是回顧性的，作者在發生的事件裡，抽繹出某些重要的因果關連，加以批判，提供現實社會的人們沉思，反省。」¹¹⁴許多類型小說都具備反映現實的功能，政治小說當然也不例外。但既然以「政治」來界定某一類小說，主要是從題材的角度出發的，換句話說，所謂「政治小說」係指以政治現象作為寫作的主要題材，和「社會小說」、「經濟小說」，甚至於「愛情小說」是屬於同等級的「類」。就原始寫作動因，或是功能的角度來看，「政治小說」從關切政治出發，表達作家的政治理念，描述政治現象（政策以及落實的問題），他可能批判，可能頌揚，一般

¹¹¹（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撰：〈一八七〇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大量創造的傳統〉，收入（英）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等撰，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頁 329。

¹¹²（德）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撰，劉宗坤等譯：《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9 月一版一刷），頁 143—頁 154。

¹¹³ 所謂衝突（Conflict），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關係者，在主觀上或客觀上，認為彼此的利益不相容，因而表現出敵意。而利益（Interest）是指資源、權力、認同、地位以及價值觀。請詳參施正鋒：《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 年 8 月初版一刷），頁 212—頁 213。

¹¹⁴ 周寧：〈〈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後評〉，收入周寧編：《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87 年 6 月初版七印。頁 132—頁 133。

來說比較傾向於前者。¹¹⁵「政治小說」能夠表達，也能描述；既可批判，也可頌揚，其作品中的社會、政治意義必需與作品的政治宣傳功能分別出來。作為一個政治、革命宣傳工具，一個文學作品的內容意義必須直接、明瞭、單一的與所指定的政治革命目的一致。但是一個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卻是極為廣泛、多層次、多角度的複雜。¹¹⁶所以王德威則認為：「所謂政治小說，不一定是立竿見影，只明白宣示意識形態或政治理念。事實上晚清四大小說，在廣義層次上都可視為政治小說。」¹¹⁷至於廣義層次與狹義層次如何分辨呢？周芬伶認為政治小說廣義的內涵不僅指『政治生活』，也包含『生活政治』；而狹義的內涵則指解嚴前後出現描寫當代或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小說，¹¹⁸與李喬認為政治小說是「對於國民黨統治進行反思的作品」¹¹⁹的定義相近。

王健壯認為政治小說的特色有三點：第一，它必須以政治現象為素材。這裡所謂的政治現象，不單指外在眼睛所看到的，它還包括了政治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第二，作品必須使讀者了解其中的政治現象為何。第三，作家必須要對他所描寫的政治現象作評價、啓示或預言。所謂評價、可以用嘲諷、幽默、抗議的方式；所謂啓示，最具體的例子是Thomas Moore的Upotia和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所謂預言，最有名的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¹²⁰邱貴芬則認為政治小說的書寫要件應包括：書寫殖民暴力、認同的困擾、權威的壓迫、資本經濟的剝削、種族的傾壓、政治理想的虛耗等六種。¹²¹所以政治小說的確不易寫，一旦寫不好，宣傳品或意念先行的評語便接踵而至。這就如蕭新煌所言：「好的政治小說必須先是好的小說，然後再看透過小說如何表達、刻畫和批判某個政治議題或某個政權體制。它必須要有『折射』政治現實的能力，但又不能完全失去小說應有的『虛構性格』；它的企圖或許是要赤裸裸的暴露現存政治體制的問題，尤其必須扣緊政治與人性的相剋關係，但卻又不能勉強表態。它固然要有當代性和當地性，但卻同時必須顧及小說應具備的普同性，一種為人性控訴的

¹¹⁵ 李瑞騰：《文學關懷》（台北：三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頁10—頁11。

¹¹⁶ 董保中：《文學·政治·自由》（台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10月再版），頁7。

¹¹⁷ 王德威：〈文學與政治——小說的世紀、政治的世紀〉，《聯合文學》第十五卷第十一期（1999年9月），頁135。

¹¹⁸ 簡定恩、周芬伶等：《現代文學》（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1999年8月初版三刷），頁301—頁307。周芬伶認為「政治小說」一詞的定義是1983年由李喬正式提出。

¹¹⁹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8月初版），頁22—頁24。不過李喬新修訂版的《小說入門》（台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8月一版四刷）已無此定義。

¹²⁰ 王健壯：〈預知毀滅紀事講評意見〉，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頁381。

¹²¹ 邱貴芬：〈政治小說：勾勒願景與希望〉，收入邱貴芬編：《台灣政治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006年8月初版一刷），頁9。

普遍性。」¹²²

關於政治小說的類型是歷來主張最紛歧的，林秀蓉將政治小說類型粗分成：「一、反應現實社會；二、貫穿歷史背景；三、見證政治事件。」¹²³林耀德分得更細，將台灣八〇年代政治小說依其政治傾向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分為包括左翼統派政治小說、懷疑論式的政治小說、右翼統派政治小說、後鄉土小說、獨派政治小說、女性主義小說、原住民自覺小說等七種類型。¹²⁴林耀德所過濾出來的這些種意識型態光譜，說明了政治小說中所具有的意識型態鬥爭的事實，也即是說，台灣的政治小說各自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傾向性，若非互為對立，至少也存在著許多異質的思考而難以有統一立場。

綜合所有定義與分類，本論文將政治小說定義為：

以政治領域的事件、人物、思想、政策、意識形態為主，旁及國家認同、歷史建構、經濟剝削、殖民情境、社會衝突對立與族群議題等現象為創作題材的小說。

由於本論文所討論的「政治小說」限定在挑戰大敘述上，所以和此無關的某些政治性強的「政治小說」（如黃凡〈聰明人〉）、「社會小說」（如張系國《黃河之水》）¹²⁵、「環保小說」（如陳恆嘉〈一場骯髒的戰爭〉）、「科幻小說」（如葉言都〈高卡檔案〉）、「女性小說」（如李昂《殺夫》）、「反共小說」（如雪眸〈家國〉）、「人權小說」（如林雙不《大佛無戀》）、「鄉土小說」（如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經濟小說」（如黃凡《財閥》）、「都市小說」（如黃凡〈人人需要秦德夫〉）、「校園小說」（如許台英〈花冠與茨冠〉）、「戰爭小說」（如羊恕〈寒江戰錄〉）等便不在討論範圍內。

¹²² 蕭新煌：〈政治流亡與政治小說〉，《聯合報》（1987年6月30日）8版。

¹²³ 林秀蓉：〈文學與政治導言〉，收入宋邦珍等：《文學與人生》（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8月初版一刷），頁241。

¹²⁴ 林耀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收入鄭明姍主編：《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初版），頁163—頁179。

¹²⁵ 一般都將《黃河之水》視為政治小說，本論文將之歸類為社會小說，范怡舒也認為：「《黃河之水》是否能稱之為政治小說是值得商榷的。」請詳參范怡舒：《張系國小說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22。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不論是文藝政策、反共文學、文學論戰、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本土論述、政治小說作家等方面研究，多少都涉及到對政治文學的處理，所以關於政治文學的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非常多，集大成者便是鄭明嫻主編的《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1994)。若單就「政治小說」而言，在學位論文方面，有林秀麗的《戰後台灣的政治小說與政治文化》(1996)、蕭義玲《台灣當代小說的世紀末圖象研究——以解嚴後十年(1987—1997)為觀察對象》(1998)、陳明柔《典範的更替／消解與台灣八〇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1999)、周慶塘的《八〇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研究》(2003)、黃文成《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2006)、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2006)、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CMT)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為中心》(2007)、陳鵬翎《李喬短篇政治小說研究》(2007)、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2007)與蔡宜君《八、九〇年代台灣女性小說的政治書寫》(2008)十本，其中《典範的更替／消解與台灣八〇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是重要部分涉及政治小說，《李喬短篇政治小說研究》以一位作家的政治小說為重點，《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則是以一個政治事件的政治小說為重點，《戰後台灣的政治小說與政治文化》是橫跨近四十年的政治小說為主，《八、九〇年代台灣女性小說的政治書寫》則是已解嚴前後的女性政治小說為主。這些研究各有特色，也各有其貢獻。

一、林秀麗的論文主要從社會學直接研究法與間接研究法來探討戰後(1950—1987)近四十年政治、政治文化與政治小說的關係。全文分成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時期(1950—1970)、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0)、文學思潮多元化時期(1980—1987)等三個時期論述，期望從為數不少的政治小說中探求作家們對中共政權、國民政府、政治事件、外交內政等看法，以及作家個人的政治理念。

二、蕭義玲考察解嚴後十年(1987—1997)小說的遷變風貌，並給予一個系統性、架構性的詮釋，期望從中見出小說與社會變遷、小說與當代思潮、小說與文學典範交替的對應關。論文一開始即從「大敘述」的觀點省視國家文化政策的敘事策略，及其如何將本身合法化的過程。中間探討小說如何呈現變遷社會的景觀，並如何對人的生活經驗作出反思。最後從文本角度檢討當代小說所衍生出的

流弊，諸如語言的膨脹、意義的曖昧不明，形式技巧的花招，小說質素的淡化等現象作結。

三、陳明柔以「感覺結構」理論（structure of feeling）切入小說文本，探究感覺結構的變遷，以及文學典範的更替。論析一九八〇年代的小說文本如何以虛構形式，深刻呈現文化語境構成元素的可能性，並掌握「感覺結構」中社會經驗的當即性，並通過小說的虛構形式，小說家如何將社會、文化各層面的不同聲音交織共鳴於小說文本之中，或在不同的小說文本的對話互詰中，深刻地呈現出台灣社會感覺結構變遷過程中細微紛攘的多元文化現象。

四、周慶塘的論文以外緣資料整理研究為主，類型判斷分析為輔，首從一九八〇年代的政治環境、文學思潮、出版品與本土意識對這階段政治小說的影響開始，繼而由政治小說的各種類型做綜合分析以了解文本所呈現的風貌與用意，最後以個別小說的差異、政治小說的優缺點與文本創作的缺陷作結。

五、黃文成以一八九五年日治時期以來的監獄文本（包含詩、散文、小說與流行歌曲）為研究對象，從時代大環境、書寫場域和創作者與文本之間的影響等三個面向來探討台灣文學中的監獄書寫精神，最後將研究的重點指向文本所呈現的人性面。而附錄方面所收錄姚嘉文、柏楊、楊青矗三位台灣當代獄中文學作家口述歷史與其入獄相關檔案，是非常難得且重要的外緣資料。

六、王建國研究對象亦以一八九五年新政治實體誕生至二〇〇五年為止的監獄文本，舉凡政治犯以其個人牢獄生活見聞、體驗為題材所寫就且曾公開刊載或付梓出版之台灣政治監獄文學接囊括在內。研究方法援用後現代史學理論、西方現代文藝理論、精神分析學、文藝心理學、社會學、人權理論、考證學、版本學等，探究文本形成深層涵義，並賦予有意義之論述架構與分期形式。研究重點為建構監獄學體系、地方士紳與知識分子從事監獄書寫之肇因、朗現台灣政治監獄文學脈絡。

七、陳璦婷以美國認知語言學家 George Lakoff(喬治·雷可夫)、Mark Johnson(馬克·詹森)在一九八〇年創立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簡稱 CMT), 來分析陳映真、宋澤萊、黃凡十八篇短、中、長篇政治小說，從其文學分析法的確能闡幽發微，窺見那整個時代的風貌與作家思考和寫作的侷限。

八、陳鵬翎是以李喬短篇政治小說為研究範圍，由外緣、創作、題材、內容、隱喻五個角度深入探討，並旁及其文化論述的文化、政治觀。認為李喬的創作和現實是相互呼應的，從台灣歷史切入，見證前人遭外力入侵、現實生活受壓迫的

軌跡，而且有不與戒嚴時期統治者妥協的勇氣和智慧。

九、洪英雪以二二八小說為核心，觀察二二八小說於不同社會情勢下的發展與特性，從中勾勒出台灣文化主體建立的歷程，並反觀歷史、政治與文學的跨領域糾葛。正文分為上、中、下編：上編將二二八事件以及二二八小說放入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來看，分別梳理介紹二二八事件與二二八小說的發展過程。中編探討國家文藝政策、投稿刊載的報刊屬性、作者個人經歷與政治立場、社會情勢等，對二二八小說內容的影響。下編分析兩性二二八小說的異同，以及由此異同所形成的對話效應。最後認為當台灣文學的定義以「台灣意識」之有無作為必要元素，以抵抗精神之有無作為首要特質，二二八小說是見證這一史觀的最佳文類。

十、蔡宜君的論文由女性主義切入，依照女性作家對歷史的傷痛、族群的認同以及對於女性參政的反思和偉人的解構等三種關注議題切入探討，並得出女性政治書寫具有瑣碎的敘事方式與感官描寫、往往與作家擅長的題材相互結合，因此情感議題不曾或缺、關心女性情慾壓抑的問題；具備了抗議／控訴的精神，表達女性角度的政治關懷，以女性小敘述突破男性書寫的大敘事架構之意義等三個特色。針對歷史的傷痛、族群的認同以及女性參政的反思做論述。

政治小說在不同歷史階段，可能被賦予不同的功能和意義，於是一次又一次的權力支配、干預、協調與流動，生產出屬於那個年代的理念實踐。政治與歷史的面向非常複雜，小說與論述所能呈現的自有其限制，不過不同時段、不同方法與不同面向的切入，便能獲得不一樣的收穫。以上論文在外緣研究的資料呈現十分豐盛，在內緣分析的理論援用也恰如其分，代表在政治小說研究區塊已有一定的成果。是以，本論文在這些研究者的基礎上，繼續往挑戰大敘述政治小說的文本探研深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高宣揚認為：「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和社會的範疇，作為一種心態、思維模式和文化範疇，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人類活動的新模式，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和論述策略，同時也是對新的社會和新的文化正當化和程序的一種質疑和挑戰。」

¹²⁶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實踐，是一種反傳統的過程，是對整個西方文化的徹底反思，其根本訴求是在迴避傳統文化之中，尋求思想上和生活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以達到他們超越權威、解構不朽、¹²⁷或者在不斷更新中被超越、改變。由此可知後現代美學的特點是以斷裂（歷史意識消失）、遺忘（重新建構）、邊緣（反中心化）、複製（無距離感）、零散（多元林立）等方式對權威、體制的主體進行顛覆，將遭人忽略的邊陲問題（弱勢族群、語言問題、女性權利、眷村議題）做多元的發聲，以達到對政治批判等目的。¹²⁸由於台灣的政治是獨特而複雜，所以許多經歷政治事件的作家都生活在文學與政治拉扯的張力之中。因此書寫政治小說，是一種悲憤中尋找對話，遺忘中重新建構，斷裂中尋找歷史，失落中平衡自我的方式。本研究擬以後現代的反大敘述為中心，針對文本中的斷裂、遺忘、邊緣、複製、零散等後現代美學特點加以分析歸納，期望呈現較明顯的政治小說風貌。

至於第二章〈大敘述的建立與演變〉，則採取法國社會學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同質化／異質化觀點。現代主義強調的是「異質」觀點，所以從同質化／異質化現象出發，探討「反共大敘述」的文學現象與挑戰滋生的原因。楊國樞將社會分化程度較低者簡稱為「同質性社會」或「單一社會」，將分化程度較高者簡稱為「異質性社會」或「多元社會」。¹²⁹這同質化與異質化最大的差異是往往是政治族群意識與省籍族群意識延伸而來的政治問題。何謂「同質性」？是指可以通約的事物與通約可能性的意識，在這顯著性關係的共同尺度作用下，所有的事物有著共同的評價標準，形成「同質性社會」。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認為生產是社會同質性的基礎，所以共同尺度的同質性社會是個生產的社會，即實用的社會。一切沒有用或有害的要素，都排除在社會的同質部分之外。所以「異質性」不一定是同質性的對立面，只是同質性無法融入的剩餘物，它包括同質性社會當作廢物或者當作高級的先驗價值來拒絕的一切。異質性可分成高等的異質性和卑賤的異質性，這兩種異質性都具有連續性欲望。在專制的法西斯結構中，權威領袖就像高等的異質性一樣，超出同質性的世俗世界，顯現他獨特又高人一等的地位；而卑賤的異質性就像士兵一樣，穿上整齊的軍裝、組成整齊的隊

¹²⁶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1年2月初版三刷），前言頁三。

¹²⁷（英）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撰，鄒建立、李靜韜譯：《後現代性及其缺憾》（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10月一版一刷），頁8。

¹²⁸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台北：淑馨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頁236—頁244。

¹²⁹ 楊國樞：〈台灣社會的多元化〉，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遷變與文化發展》，頁71。

形、邁出整齊的步伐後，這些來自卑微、貧窮、底層的異質性便消融在自我否定之中，漸漸同化成同質性。同質社會沒有能力在自身找到存在和行動的理由，這就使它依賴於絕對力量，就如統治者對貧困大眾充滿了虐待狂的敵意，這就使他們與一切想把貧困者永遠置於被壓迫狀態的社會成分結成同盟。¹³⁰這種被激起對立的異質，漸漸在彼此依偎、形成意識而恢復記憶，並建立起挑戰與突破的氛圍。

第三章〈挑戰大敘述的基本模式與敘事觀點〉援用敘事學的理論，探討挑戰大敘述政治小說的模式與觀點。首先從大部分文本中，發現「主要主顯節」(major epiphany)——即改變主角命運的政治風暴、政治事件或歷史事件——的存在，並藉由文本的上下發展關係，找尋引發主角遭遇「主顯節」的「召喚」情節與改變／影響主角未來人生的「位移」情節，而歸納出「召喚——主顯節——位移」的一個變化型基本公式（請詳參「附錄二：政治小說文本敘事基本模式分析一覽表」）。接著，從文本中的暴力現象、狂歡節理論、排泄物等男性敘事觀點，和文本中的受迫形象、隱喻、換喻等女性敘事觀點，來探討白色恐怖政治的荒謬與台灣主體歷史的建構。

第四章〈挑戰大敘述的敘事手法〉，從諷刺、批判、寓言三個向度分析挑戰大敘述的書寫對抗與禁區衝撞。諷刺作為一種形式與邏輯緊密結合的敘事技巧，富含著政治書寫的挑戰姿勢與挑戰風格；批判並非單純性破壞，而是藉由拒絕的手勢與顯眼的言論，祛除政治陰影，重構更公平的公共環境；寓言本身即帶有外在虛構性質，通常是國族敘述的顯現，具有對反射現實與建構未來的特色。所以挑戰大敘述的敘事手法不只是體現政治小說作者的理念，同時也是權力的展現與反抗當權執政的論述能力。

第五章〈挑戰大敘述的敘事題材〉採取題材類型分析法，將挑戰大敘述的政治小說文本分成政治禁忌、人權自由、族群母語與歷史事件等四個題材類型分析。在急欲發聲的時代或恢復記憶的年代裡，文學頓時成為衝撞體制與改革現實的肉搏工具，不論是涉及當權者引以為忌的政治事件、政治政策，或反映政治恐懼、爭取言論自由，或挑戰國語政策的混語、母語書寫，或反對大敘述的歷史觀，創作政治小說的作家們皆以文字與觀察，雕塑出戒嚴時期的某種真實風情。

第六章〈結論〉則歸納上述分析的結果，計有一、拒絕遺忘，主動對話；二、

¹³⁰ 請詳參(法)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撰，胡繼華譯：〈法蘭西主義的心理結構〉，收入(法)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撰，汪安民編：《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一版一刷)，頁43—頁74；石計生：〈從戒嚴民主化到揉成一團的後現代台灣〉，收入王宏仁等主編：《跨越：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8年11月一版一刷)，頁356—頁362。

反映現實，自我詮釋；三、放大身影，追尋真相；四、淘洗作用，重新審判；五、尋找中國，發現台灣等五點結論。

研究結構表

篇名	研究方法
第一章 緒論	歸納分析法、巴塔耶的同質化／異質化觀點
第二章 大敘述的建立與演變	李歐塔後現代觀點、(準)戰爭體制、強制性權威／誘導性權威、急迫感／假性急迫感
第三章 挑戰大敘述的基本模式與敘事觀點	敘事學、解釋互動論、狂歡節理論、髒話學
第四章 挑戰大敘述的敘事手法	敘事手法分析、修辭學
第五章 挑戰大敘述的敘事題材	主顯節觀點、敘事題材類型分析
第六章 結論	歸納第三、四、五章的研究成果



